

# 内蒙古巴林左旗召庙庙会的民俗文化内涵考述

乌日罕

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本文以内蒙古巴林左旗召庙庙会为个案, 从民俗学视角, 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辨, 梳理其历史沿革及庙会形态, 分析集市贸易与特色活动如何整合政府、村民、游客等多元主体, 构建宗教、经济与文化融合的综合文化空间。研究表明, 主体互动为庙会注入活力, 彰显民俗传统的现代化适应与再生产, 为北方民族地区庙会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庙会; 民俗文化; 多元主体

**DOI:** 10.64216/3080-1486.25.11.095

## 引言

庙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集宗教仪式、商贸活动与民俗展演于一体的民俗事象, 是观察地方文化的重要窗口。近年来, 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和乡村旅游的发展, 传统庙会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呈现出现代转型特征。目前学术界的庙会研究多集中于中原和江南地区, 对北方民族地区, 特别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区域的庙会研究尚显不足。

基于这一研究背景, 本文选取内蒙古巴林左旗召庙庙会为个案, 依托民俗学的整体研究视角, 结合历史文献考辨与实地田野调查, 旨在: 第一, 系统梳理召庙自辽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演变与文化内涵, 厘清其历史发展脉络; 第二, 详细剖析庙会中集市贸易所体现的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 以及庙会特色体验活动的象征意义与实践逻辑; 第三, 重点分析政府、周边村民与不同类型游客等多元主体在庙会中的角色功能、行为策略及其互动关系, 探讨传统庙会在当代社会中的存续机制与创新路径。

通过这一研究, 本文试图揭示召庙庙会如何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实现宗教神圣性与世俗性、经济行为与文化实践的多维整合, 从而延续其千年生命力。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北方民族地区庙会文化特征的认识, 也可作为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的适应性转型与文化再生产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实证案例。

## 1 巴林左旗召庙的起源与历史沿革

### 1.1 召庙的起源

巴林左旗召庙, 蒙古语名为“格力贝尔召”。该庙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 20 公里处, 由

石窟和外殿两部分构成。召庙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约一千年前, 契丹人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 史称辽王朝, 其都城便设立于现今的巴林左旗林东镇。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即辽太祖)在完成部族统一大业后, 于天显元年(公元 927 年)推行宗教文化整合政策。据《辽史·地理志》记载, 辽太祖曾下诏, 将幽蓟地区以崇文法师为首的五十人僧团迁徙至新确定的都城西楼, 即后来所称的上京临潢府, 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 并敕令修建天雄寺, 以供这些僧众居住修行<sup>[1]</sup>。据《辽史》相关记载及石窟内题记考证, 其开凿年代约为辽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 曾是为辽皇室礼佛的重要场所。召庙在辽代的历史背景下, 其功能不仅局限于宗教活动场所, 更成为辽代“因俗而治”统治策略的重要体现<sup>[2]</sup>。

### 1.2 召庙的历史沿革

巴林左旗召庙是一座古老而神秘的千年石窟寺,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 于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称谓。这些称谓的形成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民俗传说紧密相连。

#### 1.2.1 真寂之寺

据《辽史·地理志》记载,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于上京道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兴建了一系列宗教建筑, 其中真寂之寺处于核心地位, 与周围十六座佛寺共同构成了辽上京佛教文化体系<sup>[3]</sup>。1974 年, 考古工作者在该寺石窟顶部发现“真寂之寺”四字楷书题记, 为该名称提供了实物证据<sup>[4]</sup>。“真寂”一词出自佛教经典, 指释迦牟尼涅槃所达的究竟寂灭境界, 与该窟中雕凿的涅槃像主题高度吻合。学者指出, 真寂之寺的营建不仅具有宗教纪念意义, 也体现了辽初统治者通过

佛教仪轨强化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图<sup>[5]</sup>。其石窟形制与造像风格,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也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工艺与技术,是辽代“因俗而治”政策在宗教文化中的具体体现。

### 1.2.2 卧佛寺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嘉木样二世活佛东行至巴林左旗七棵树地区,因南山异象而重新发现该石窟。因此地雕有面东侧卧的释迦牟尼涅槃像,该寺得名“卧佛寺”。该窟中的卧佛全长3.6米,以整块花岗岩雕成,其面东侧卧的布局打破佛教头北面西的传统仪轨,反映出契丹拜日崇东的习俗,是民族信仰与佛教艺术融合的重要实例<sup>[6]</sup>。窟内造像分为三层,分别表现皇室、罗汉与世俗供养人,空间秩序体现了契丹的三重宇宙观<sup>[7]</sup>。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所立蒙文碑铭表明,该窟为辽兴宗景福元年(1031年)敕建,具有皇家石窟寺的典型特征<sup>[8]</sup>。

### 1.2.3 善福寺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巴林左、右两旗王公迎请格鲁派活佛嘉木样协巴多吉主持宗教事务,并于石窟前增建佛殿<sup>[9]</sup>。经清廷理藩院批准,左旗寺获名“善福寺”,右旗为“崇慧寺”。因召庙地处左旗境内,后期管理权尽归左旗,“善福寺”成为清代文献对该寺的主要称谓。

### 1.2.4 “召庙”与“后召”

召庙(蒙语全称  $\text{ᠰᠠᠭᠤᠮᠤᠳᠤ}$ , 意译为“具光之寺”)。根据《巴林左旗宗教源流考》所载,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教法开示中,系统阐释了佛教东传的光影隐喻:“世尊顶严焕五智光明,青黄赤白四色遍照中原,其金辉余脉迤北而行,驻锡于查干木伦河畔,即今召庙所在地<sup>[10]</sup>。”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在巴林左旗及周边牧区流传着五色五台传说。传说中,五台山由五个不同地方、呈现出五种不同颜色的区域组成,被称为“五处五光五色”,其中,召庙被称为白五台,山西的五台山被称为黄五台,除此之外,还有绿五台,蓝五台和乌兰五台<sup>[11]</sup>。此外,因寺庙背倚圣山、坐北朝南,当地村民依其方位称之为“后召”。

## 2 召庙庙会的集市贸易

召庙庙会每年农历四月十四至十六日举行,各类摊贩汇聚于寺庙周边,笔者通过对庙会摊贩的访谈发现,他们将庙会视为重要的年度经济机会,并制定生计策略。一个典型案例——市级非遗“葫芦烫画”传承人梁树

明夫妇。他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葫芦种植与烫画创作,产品依据尺寸与工艺复杂程度定价在20至150元之间。庙会期间其销售额与客流量显著高于平日。消费者购买行为多出于文化象征意义的认同,如“葫芦”谐音“福禄”所蕴含的美好寓意,反映出文化符号消费的显著特征。

庙会集市因而超越单纯商品交换的范畴,成为经济行动与文化意义互嵌的社会空间。手工艺者通过技艺展演和产品叙事强化工艺传统与身份认同,消费者则经由商品参与地域文化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同体建构。这种双向互动过程,不仅提升了摊贩的家庭经济收益,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延续与再生产,从而构成庙会在当代社会中的内生性生命机制。

## 3 召庙庙会的特色体验活动

在召庙庙会的特色体验活动中转桃石、攀阎王道、钻再生洞——这三项充满象征意义的体验,共同构成了寓意深刻的“人生三关”。

### 3.1 阎王道

阎王道是一条天然形成的狭长沟槽。这条沟槽呈东南—西北走向,最宽之处仅约一米,与地面夹角约45度,向远方延伸20余米。站在沟槽正下方仰头观望,陡峭的岩壁仿佛直插天际,当地民间将其称为“阎王道”。其攀爬难度颇高,攀登者必须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山顶。而且在中途如果想要放弃,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根据民间信仰的阐释,攀爬阎王道蕴含着深刻的宗教象征意义。信徒期望通过克服攀登过程中的艰难险阻,来洗除现世的罪孽、消除病痛。

### 3.2 桃石山

沿阎王道攀登至顶,可见山体南侧矗立着一块高十余米的巨型岩石,民间则因其形似寿桃而俗称桃石山。

环绕桃石三圈的转石祈福仪式,承载着蒙古族自然崇拜的古老信仰,相传可禳灾避祸、延年益寿。桃石紧邻悬崖而踞,其环形路径平均宽度仅0.8米,行人需紧贴崖壁谨慎挪步,因岩表经年风化异常光滑,每一步都考验着祈福者的虔诚与胆识。在民间叙事中,桃石被赋予两种神秘传说:一说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时遗落的仙桃所化,另一说则与格萨尔王传说相关,称其为镇压龟精的降魔法器。这些传说为桃石的地质奇观叠加了文化隐喻,使其成为自然景观与民间信仰交织的文化符号。

### 3.3 再生洞

再生洞是桃石北侧的狭长通道，全长约 10 余米，呈 S 形延伸于山体内部。该洞穴后山入口仅容单人侧身进入（宽度不足 0.3 米），前山出口受地质构造影响形成渐进式狭窄通道。体验者需采取特殊通行方式：首先以头部为先导进入洞腔，在保持躯干与岩壁摩擦平衡的状态下完成脊柱屈曲动作，继而通过上肢外撑与髋关节外旋的协同运动完成骨盆通过，最终依靠下肢反向牵引实现整体位移。这种特殊的通行体验为理解人类分娩机制提供了具象参照——体验者通过亲历洞穴狭窄空间的物理限制，能够直观体悟胎儿娩出时面临的生物力学挑战，进而深化对分娩疼痛的感知认知。

## 4 庙会产生的多元主体

依托集市贸易与特色体验活动的吸引力，各类人群主动参与庙会活动，共同形成了庙会的多元主体体系，而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参与，正是庙会保持活力的重要支撑。

### 4.1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作为庙会文化治理的重要主体，首先，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推动庙会传统的延续与现代转型。巴林左旗政府严格遵循《内蒙古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将庙会纳入地方社会治理体系，成立宗教事务领导小组，制定景区规划，实施嵌入式管理。其次，在空间层面，政府通过 PPP 模式开发召庙核心景区，建设游客集散中心、契丹迷宫等设施，将宗教空间拓展为文化体验复合场域<sup>[12]</sup>。景区建成后，庙会也由地方民俗活动升级为区域旅游品牌。

### 4.2 周边村民

周边村民作为庙会核心能动者，融合了信仰实践、经济行动与文化展演三重角色。村民参与庙会动机多元，包括朝拜祈愿、休闲娱乐、摆摊经营、技艺展演等。访谈案例显示，一位牧民提到在春旱时集体诵经求雨，其后降雨被视为神灵显灵，折射出民间信仰与自然节律的紧密关联。一位香烛摊主表示，庙会经营是家庭重要收入来源，日均净收益约 60-80 元。一位自治区级木雕非遗传承人则通过庙会展售作品、招收学徒，实现技艺传播与文化延续。

### 4.3 各方游客

依据来源、动机及行为模式，游客可分为三类：朝圣型以祈福许愿为核心的中老年群体，多来自内蒙古东

部盟市及毗邻的河北、辽宁等藏传佛教文化影响区，通过转桃石等身体实践完成神圣体验；消费型以打卡体验为核心的青年休闲群体，聚焦网红景点拍照直播、参与娱乐项目、购置伴手礼等，直接推动庙会经济业态升级；介入型：以自媒体博主、摄影师等知识阶层为主，兼具参与者与观察者双重身份。例如抖音“召庙讲解——王导”账号，通过直播与短视频将召庙文化转化为适配新媒体的内容，总获赞 36.4 万次，实现地方宗教文化符号的跨地域传播与大众化解读。

##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巴林左旗召庙庙会的起源、历史沿革、集市贸易与特色体验活动的系统考述，尤其是对政府、村民与游客三类主体在庙会中的角色与互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传统庙会在当代社会中的存续动力与实践逻辑。研究表明，主体互动为庙会注入活力，彰显民俗传统的现代化适应与再生产，为北方民族地区庙会研究提供参考。

## 参考文献

- [1] 谭其骧.《辽史·地理志》汇释[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 版.
- [2] 脱脱.《辽史》[M].中华书局,2003 年第一版.
- [3] 脱脱等撰.《辽史》卷 37《地理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6,p513.
- [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辽上京真寂之寺石窟题记发掘简报[J].文物,1975(3):56-61.
- [5] 朱子方,王承礼辑校.《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203.
- [6] 脱脱等.《辽史·礼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 [7] 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
- [8] 《内蒙古喇嘛教碑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
- [9] 《巴林左旗志·宗教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184.收录的乾隆十五年《善福寺建寺碑》蒙文碑刻.
- [10] 巴林左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巴林左旗宗教源流考》.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 年,127 页.
- [11] 采访者:乌日罕,被采访者:额尔敦吉如嘎、女、78 岁、牧民,收访地点:查干哈达苏木家中,受访时间:2025 年 2 月 10 日.
- [12] 巴林左旗人民政府网.召庙核心景区项目开工建设[EB/OL].2017-04-11.